

四川省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财政政策的 区域效应研究

Caizheng Zhengce de Quyu Xiaoying Yanjiu

王文甫 窦义海 刘兆法 侯先瑞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项目编号: JBK160801)

四川省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财政政策的 区域效应研究

Caizheng Zhengce de Quyu Xiaoying Yanjiu

王文甫 窦义海 刘兆法 侯先瑞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王文甫等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504 - 2408 - 1

I. ①财… II. ①王… III. ①财政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F8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9429 号

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

王文甫 窦义海 刘兆法 侯先瑞 著

策划编辑:何春梅

责任编辑:何春梅

责任校对:唐一丹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bookej.com>

电子邮件 booke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 - 87353785 87352368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4 - 2408 - 1

定 价 68.00 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前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当探究这种“大国发展道路”背后的本质原因时,研究者发现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和技术不仅远不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还不如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其中地方政府行为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国内学者在此方面很少进行深入研究。为此,本书以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益的研究。本部分充分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在合理界定了公共资本的投资范围后,运用永续盘存法,构建了资本存量估算中的四个核心指标,尝试估算出了1978—2012年全国及1993—2012年31个省市的公共资本存量。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公共资本存量对其地区生产总值的协整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公共资本存量增长率、私人资本存量增长率三个序列变量都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东部地区的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为0.345 2,较为显著;中部地区的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为0.019 3,并不显著;西部地区的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为-0.158 3,显著为负;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私人资本存量的产出效应分别为0.563 3、0.517 4和0.590 8,三者较为接近且都较为显著。由此可见,就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平均效应而言,基于不同区域的相关数据,其估计的结果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即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大于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各区域和各省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并不完全是由国家公共资本的投资差异导致的,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市场条件、人力资源和投资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各省市之间所吸引的私人资本存量和资本利用效率存在

较大差异,从而导致了各地区之间以及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较大差距。

第二部分是分权视角下对我国财政支出的收敛性研究。本部分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0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海南除外),对我国财政支出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分税制实施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呈现出显著发散特征,在控制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变量时,我国财政支出呈现出条件收敛特性。本书进一步比较了不同地区财政支出收敛特性,发现受益于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影响,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条件收敛速度远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落后,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边际效应高,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大于东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收敛,但对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收敛没有显著影响。

然后,基于全国和三大经济区域样本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收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就财政支农支出而言,在1994—2010年间,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呈现发散特征,而东部和中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具有显著收敛特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抑制了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但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就科教文卫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而言,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无论在全国各省份之间,还是三大经济带内部不同省份之间,均呈现出发散特性。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增加科教文卫投入具有激励作用,但其对东部地区和中部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同样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且中部地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发散速度远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有助于东部地区减少预算内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却为西部和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官员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提供了动机激励。

第三部分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结构失衡进行了探讨。本部分从地方政府的视角对中国结构失衡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利用中国省级年度数据分析,发现由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而促使其投资占比的上升与经济结构失衡这两类现象并存。另一方面,借鉴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框架,揭示了这两个现象是否存在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分别对大企业的模型、中小企业的模型、粘性价格模型三种模型经济进行模拟,并比较分析发现,这两类现象之间存在一种逻辑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结构失衡的机理如下:一是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最大化,于是一方面,它们突出表现为

支出的有偏性,偏重于生产性支出而增加政府投资,通过既推动总需求,又促进供给能力的提高,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因素存在,企业投资效率提高,从而促使了企业投资增加。二是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招商引资,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其中,大企业更容易受到它们的青睐,得以融资,而中小企业则存在融资约束。于是大企业的投资会增加,带动了短期内经济总量和税收的较大幅度的提高。三是由于实体经济中金融摩擦的存在,经济高涨会使企业的风险贴水减低,促使社会投资水平的提高。因此,地方政府投资增加,通过以上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引致了社会投资较大幅度地增加,国民收入更倾向于资方,而不是劳方,于是消费者收入随时间推移增加较为缓慢,最终导致了社会投资率上升、劳动收入比的下降和居民消费率的减低,加剧了结构失衡问题。

第四部分就我国税收结构对投资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税制结构成为这部分研究所选择的对象,具体是关于税制结构对投资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这部分主要是将国民经济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划分,分区域进行税制结构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研究。首先,从检验判断税制结构对投资产生的实际影响的角度出发,采用1999—2011年以来的相关样本数据,主要运用了统计基本分析法以及动态均衡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计量模型研究,探讨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占比,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总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以及历年来税收对固定资产投资率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研究结论显示:1999—2011年,直接税占比的不断增加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的增加,直接税的增加能够促使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国民收入分配理论而言,间接税占比减少意味着政府从企业缴纳的税款减少,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就会增加投资资本,在民间资本成为投资主体的情况下,与直接税占比增加对投资率的正相关性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三个地区的系数的绝对值中,中部大于西部,西部大于东部。这说明十三年间直接税占比增加对投资率的影响程度也是中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小。这应该与中部、西部地区高速的投资增长率,以及投资市场中民间资本发展正处于较强劲的上升阶段具有相关性。直接税占比与投资率是存在相关性的,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相对规模的增长促进了投资率的提高。在以五个主要税种占总税收比为自变量的投资率估计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东部、中部、西部存在的差异。三个地区的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对投资率的影响均呈负相关,同时营业税的系数绝对值都比较相近。这说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对投资率的影响地区差异并不大,在投资的调控方面中可以采取一致的营业税和个

人所得税税收政策。

在此,对本书的作者做一个说明。本书的第一、第二、第四篇是在已经毕业的我的三个硕士生的毕业论文上修改而成的,撰写第一篇的是窦义海和王文甫,撰写第二篇的是刘兆法和王文甫,撰写第四篇的是候新瑞和王文甫,而第三篇是由王文甫撰写,王德新为本书做了大量的编排工作。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两位老师。第一位是何春梅老师,在她的鼓励下,本书申请四川省社科立项重点出版并获得资助;在她的督促下,我在修改书稿中克服了自己的疏懒弱点,更加认真地对待修改工作。第二位是唐一丹老师,她对我们的书稿进行了认真修改和校对,一丝不苟的态度使我在校对书稿的过程中来不得一点马虎。这两位老师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做好学问的要义就是“认真”二字。

目 录

第一篇 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益研究

1 文献综述 / 3

1.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3

1.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4

2 公共资本存量估算及其比较分析 / 6

2.1 公共资本投资范围的界定 / 6

2.2 永续盘存法简介 / 8

2.3 基期公共资本存量的确定 / 8

2.4 每年公共资本投资额的确定 / 10

2.5 折旧率的确定 / 11

2.6 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 / 14

2.7 对原始投资数据来源的分析和缺失数据的处理 / 15

2.8 估算结果及其比较 / 17

3 公共资本投资的经济效益分析 / 23

3.1 东部、中部、西部各省市公共资本投资效率 / 23

3.2 人均公共资本存量及经济增长 / 26

4 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33

4.1 数据的选取和说明 / 33

4.2 各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34

4.3 协整检验 / 36

4.4 脉冲响应分析 / 40

5 总结与政策建议 / 43

第二篇 分权视角下中国财政支出的收敛性研究

6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53

6.1 经济收敛理论 / 53

6.2 财政分权理论 / 55

7 中国财政分权影响财政支出收敛的机制分析 / 58

7.1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演进历程 / 58

7.2 财政分权影响地域财力均衡的机制 / 61

7.3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 / 64

7.4 财政支出收敛计量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 66

8 中国财政支出收敛性研究的延伸与扩展 / 75

8.1 中国财政支出的“俱乐部”收敛 / 75

8.2 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收敛影响的实证分析 / 79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6

9.1 研究结论 / 86

9.2 促进地域财政能力均等化的政策与建议 / 87

9.3 本书的不足之处及延展方向 / 89

第三篇 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结构失衡

- 10 提出问题 / 95
- 11 文献综述及其拓展 / 98
 - 11.1 基于政府与体制方面的解释 / 98
 - 11.2 基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解释 / 99
 - 11.3 基于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 99
 - 11.4 基于技术进步与非完全竞争因素的解释 / 100
 - 11.5 基于收入分配和边际消费倾向因素的解释 / 100
 - 11.6 不确定支出预期和个体理性角度的解释 / 101
- 12 地方政府投资与结构失衡的特征事实 / 103
 - 12.1 数据说明 / 103
 - 12.2 特征事实 / 104
- 13 理论模型及其参数校准 / 108
 - 13.1 模型的经济背景考察 / 108
 - 13.2 模型的建立及结构 / 110
 - 13.3 模型的参数校准 / 115
 - 13.4 模型传导机制分析及经济结构失衡解释 / 119
 - 13.5 总结和说明 / 124

第四篇 中国税收结构对投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 14 研究的理论背景 / 133
 - 14.1 税制结构对投资的影响机理 / 133

- 14.2 中国税制结构概述 / 135
- 14.3 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概述 / 137
- 14.4 二者相关关系概述 / 138
- 15 中国税制结构和投资现状的分地域描述 / 139
 - 15.1 东部、中部、西部税制结构现状分析 / 141
 - 15.2 东部、中部、西部固定资产投资现状 / 146
- 16 实证分析 / 148
 - 16.1 变量的选择 / 148
 - 16.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148
 - 16.3 数据统计描述 / 149
 - 16.4 模型估计 / 152
- 17 分地域投资率与税制结构均衡关系分析与比较 / 156
 - 17.1 各地区投资率与税制结构均衡关系分析 / 156
 - 17.2 各地区投资率与税制结构均衡关系横向比较 / 157
- 18 研究结论对税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 160
 - 18.1 具体税制改革政策的建议 / 161
 - 18.2 其他角度的借鉴意义 / 162

第一篇

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 估算及其经济效益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在国外,关于公共资本存量估算及其产出效应的研究较早。Aschauer (1989) 在其具有开创性贡献的研究中发现,美国的公共资本具有很强的正产出效应,公共资本甚至比私人资本的生产力更高。然而,在 Aschauer 的早期研究之后兴起的大量实证研究开始对其上述研究结果产生了挑战。Gramlich (1994)、Sturm 和 Kuper (1998)、Seitz (2001) 等同样认为政府资本具有正的产出效应,但认为这些效应的大小通常比 Aschauer 的研究小得多。

由于缺乏较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成员国的公共资本存量数据,使得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集中于美国。少有的研究调查其他 OECD 国家的公共资本生产率,如 Ford 和 Poret (1991)、Evans 和 Karras (1994)。他们的研究数据都来自于 OECD (1997),包括 12 个成员国在 1970—1996 年的资本存量序列。但是,由于不同国家间的估算方法差异很大,因此这些 OECD 国家的数据并不具有国际可比性。这也是亚太经合组织在 1997 年之后停止出版资本存量序列并联合成立资本存量统计堪培拉小组的原因之一,它们的活动最终导致了资本测量手册的出版。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调整了自己的估计方法,因此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资本存量数据仍然是不可用的。

尽管有这些约束,对公共资本生产率的分析仍然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最近的研究多使用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的方法,如 Mitnik 和 Neumann (2001)、Voss (2002)、Kamps (2005)。不同于早期利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方法,他们并没有对被研究的变量强加某些因果联系。但 VAR 模型的主要缺点是通常需要大数据样本以满足常规滞后长度。出于这个原因,

大多数研究人员采用 VAR 方法时,用公共投资的数据来替代公共资本存量数据。这种选择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缺少多数国家的资本存量数据;二是可以获得每季度的公共投资数据,而公共资本存量只能获得年度数据。这种选择的缺点为存在着公共投资的效果是独立于相应的资本存量水平的隐含假设。经济理论表明,这种假设是值得怀疑的。根据报酬递减法则,如果在前期资本存量较大,增加一定数量的公共资本存量会有一个较小的输出效果;反之亦然。Demetriades 和 Mamuneas (2000) 指出,的确有证据显示公共资本边际生产率是快速下降的。

Kamps (2006) 使用基于几何折旧模式的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 22 个 OECD 成员国在 1960—2001 年年度的资本存量数据。他将资本存量数据分为以下三类:(1) 非住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2) 私人住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3) 政府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通过改变主要估计假设的参考国家(美国)的一个敏感性分析,Kamps 探讨了资本存量估计的强健性。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基准资本存量的估计是强健的。他还分析和比较了生产函数法的估计结果,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关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是积极的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大多数国家的产出弹性相当大。基于一个简单的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Kamps 估算出在 OECD 成员国中,公共资本的平均产出弹性为 0.2。Erden 和 Holcombe (2006) 研究了 19 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 1970—1998 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1.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有关公共资本存量估算及其产出关系的研究略显滞后,这与中国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公共投资效率问题的现状具有一定匹配性。马栓友(2003)对中国相关年份的数据进行生产函数法分析,认为中国的公共资本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产出对公共资本的弹性为 0.55,而且对市场化部门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张海星(2004)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了计量经济模型,对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是 0.296。虽然他们对公共资本产出效应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们的研究都是采用的公共资本投资数据而不是公共资本存量数据,这对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可信性有一定的影响。缪仕国等(2006)通过建立生产函数模型并对公共资本的产出效应进行估计,

结果发现中国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大约为 0.4, 且与 GDP 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6) 依靠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 对我国 1978—2004 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结论表明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何刚和陈文静 (2008) 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各省份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进行估计, 结论是东部和中部省份的产出弹性系数大部分为正, 西部省份的弹性系数则大部分为负, 且并不显著。尽管不同学者研究的结论各有不同, 但都基本上认为中国的公共资本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上述研究中, 不同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都是直接给出了公共资本存量数据, 而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具体估算方法没有详细说明, 且他们所利用的公共资本存量数据都仅限于全国层面, 而没有具体到各省际层面。

公共资本存量尤其是省际数据估算的精确与否, 直接关系到投资函数、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公共投资是否有效率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研究结果是否科学, 从而影响到政府出台的财政政策内容。因此我们需要对省际的公共资本存量加以较为科学和准确的估计。

国内对资本存量估算的相关研究众多 (张军、章元, 2003; 张军, 等, 2004; 薛俊波、王铮, 2007; 朱平芳、徐大丰, 2007; 单豪杰, 2008; 叶宗裕, 2010; 徐杰, 等, 2010; 金戈, 2012), 但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针对全国、部分省市或部分行业等物质资本存量及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 而专门针对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的研究并不多, 尤其是关于省际公共资本存量的估算更是寥寥无几。陈志国 (2005) 依据大口径公共资本形成额和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测算了中国 1978—2001 年的公共资本存量数据和私人资本存量数据。张学文 (2010) 在明确了公共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口径之后, 估算了 1952 年的公共投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 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 1995—2007 年中国公共投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张勇 (2010) 首先估算出了 1978 年全国的资本存量数据, 然后分解为公共资本存量和私人资本存量, 从而得出了 1978—2007 年的公共资本存量数据。但由于上述学者在估算过程中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以及各核心变量的假设不同, 因此他们的估算结果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 对各省份的公共资本存量进行科学合理的估算有一定的价值空间。金戈 (2012) 在估算了全国层面 1953—2008 年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基础上, 虽然估算了省际层面 1993—2008 年各年末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但其估算的资本存量范围仅限于基础设施, 并不能替代公共资本存量。陈碧琼、张梁梁和曹跃群 (2013) 通过对资本的性质进行分类, 先是估算了 1980—2011 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 进而开创性地估算了全国 29 个省市 (未计算西藏, 重庆的数据合并到四川) 1985—2011 年的公共资本存量数据, 填补了国内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的数据空白。

2 公共资本存量估算 及其比较分析

2.1 公共资本投资范围的界定

关于中国公共资本投资的范围,概括起来一般有三种:一是政府预算所列示的范围和数量。这种口径没有包含政府的转移性支出。二是对现行预算中相关预算科目调整并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确定并测算的数量。这种方法中的国债投资已经构成部分基建支出、挖潜改造等支出内容,若将国债单独列项,会造成重复计算。三是以宽口径估算的公共资本支出,但一般相关数据隐蔽且难以统计,只能用作宽口径估算。上述三种统计口径虽然都涵盖了较为丰富的内容,但是都很难避免重复计算或涵盖所有应统计内容进而进行全面、系统的统计。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公共资本投资范围的界定,国内经济学界一直都没有达成一致。马栓友(2000)定义的公共资本包括电力、煤气、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探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仓储业和邮电通信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缪仕国等(2006)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部门的固定资产总额列为公共资本。李桢业和金银花(2006)认为公共资本投资是扣除了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及其他部分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尹贻林和卢晶(2007)通过对公共投资经济效应的分析,给出了公共投资范围的界定,包括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等事业发展支出和服务于产业政策的财政补贴。陈碧琼等(2013)依据我国1984年首次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以及1994年、2002